

国际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策略研究

许为盛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广东 深圳 518172

DOI:10.61369/ER.2024050007

摘要： 国家之间的竞争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当今时代国家之间经济的较量是最激烈，而国际贸易是经济活动的重要部分。为了应对中美贸易间的逆差，美国以其惯用的霸凌、单边和保护主义思维挑起了新一轮贸易摩擦。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中心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 国际贸易摩擦；关税战；应对策略

Study on the Influence and Atrateg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 on Chinese Economy

Xu Weisheng

Shenzhen MSU-BIT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172

Abstrac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ountries covers many field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etc. In the current era, the economic contest between countries is the most intens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trade defici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US has provoked a new round of trade frictions with its usual bullying, unilateral and protectionist thinking. This paper takes Sino-US trade friction as the center to study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 tariff wars; coping strategy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

（一）经济层面：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中美关税战的直接导火索是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至2023年已突破3364.9亿美元。美国将这失衡归咎于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然而，美国贸易逆差本质上是其国内储蓄率过低^[1]、消费过度等结构性问题^[2]所致，而中国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客观上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高性价比商品。

（二）政治层面：霸权焦虑与战略遏制

美国对华关税战的核心逻辑其实是“霸权焦虑”^[3]。苏联解体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一直是“一超多强”的格局，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逐渐壮大，美国战略界开始渲染“修昔底德陷阱”，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

在此背景下，关税战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工具之一。2018年3月，特朗普以“301调查”为由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一行动标志着中美从经贸摩擦升级为全面战略竞争，通过关税战迫使中国在产业政策、市场准入等问题上让步^[4]。今年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继续强调本土产业和就业而再次发动关税战，其认为可以通过时间逐渐重塑全球供应链^[5]，并减少进口依赖。

（三）制度层面：意识形态与规则博弈

中美贸易摩擦本质上是两种制度模式的碰撞。美国强调“自由市场经济”，指责中国通过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干预经济。而

中国则强调“新型举国体制”，认为政府在关键领域发挥作用是后发国家追赶的必然选择。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规则制定权争夺。美国试图通过关税战重塑全球贸易规则。中国则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机制，强化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双方在WTO改革、数字货币监管等领域的博弈，实质上是争夺21世纪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

（四）全球层面：地缘政治与供应链重组

地缘政治因素进一步加剧关税战复杂性。美国近几年通过重返亚太战略，不断拉拢中国周边国家，试图构建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政治经济体系^[6]。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全球布局。双方在芯片、稀土等战略资源领域的博弈，正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五）技术层面：创新竞争与脱钩风险

技术领域是中美关税战的核心战场。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政策，限制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中国则加大研发投入，2021—2023年半导体产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速达28.7%，长江存储、华为等企业在芯片制造、5G通信等领域取得突破。技术脱钩风险加剧关税战不确定性。美国试图通过“小院高墙”策略^[7]，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与中国“脱钩”。

综上，中美贸易摩擦其实是经济、政治、制度、全球、技术等多重矛盾交织的结果。其本质是美国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维护霸权地位，而中国则坚持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并重。这一博弈不仅影响两国经济，更将重塑21世纪全球经济秩序。

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贸易摩擦导致中国出口增速放缓，美国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日益激烈的贸易摩擦使得中国产品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削弱，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贸易摩擦引发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国内企业的投资决策，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

但是长期来看，贸易摩擦促使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国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推动产业向高端智能绿色化方向发展^[9]。同时，贸易战也加速了中国内需市场的培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

（一）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贸易摩擦导致中国部分传统制造业出口受阻，订单减少，利润下滑。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竞争力不足，使得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家具等遭受冲击。为应对成本上升和市场需求变化，部分企业不得不将生产线转移至东南亚等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就业。

贸易摩擦促使中国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中国加速了国产替代进程，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中国企业凭借技术突破和成本优势，实现了“制裁一突破一反超”，比亚迪等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提高了产业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

贸易摩擦凸显了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促使中国更加重视内需市场的培育。政府近些年出台了一系列补贴和其他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9]。国内市场的壮大有助于缓解外部贸易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增强中国产业结构的稳定性和韧性。

（二）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影响

关税壁垒直接冲击出口导向型产业，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工厂订单流失导致阶段性失业。纺织、家具、电子组装等行业的用工需求萎缩，部分中小企业通过裁员降本求生。但制造业企业通过自动化改造对冲人力成本，反而催生智能制造领域技术岗位需求增长。此外，贸易摩擦倒逼产业升级，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加速人才吸纳，跨境电商、数字服务等新业态创造大量灵活就业岗位。

这场博弈虽引发短期就业波动，但推动中国就业市场向技能密集型、创新导向型转型，加速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跃迁。

（三）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直接削弱出口价格优势，导致机电产品、纺织品等传统优势领域订单流失。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增速较贸易战前下降4.2个百分点，但高技术产品占比逆势提升3.7%，显示出口结构正由“量增”转向“质升”^[10]。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开拓欧洲、东盟等新兴市场，有效对冲单一市场风险。

中国大幅削减美农产品采购，大豆、猪肉进口转向巴西、阿根廷等国。同时扩大欧洲机械设备、日本电子元件采购规模，关键零部件国产替代率逐渐提升。能源进口方面，LNG采购来源从

北美转向卡塔尔、俄罗斯，供应链韧性显著增强。

跨境电商异军突起，2023年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额突破2.38万亿元，义乌小商品通过“组货拼箱”模式进入新兴市场。部分加工贸易企业采用“内地-越南-美国”转口路径，利用原产地规则规避关税壁垒。

这场持续数年的贸易博弈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变得更加紧张，虽使中国外贸短期承压，但推动贸易结构向技术密集型、市场多元化方向转型，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四）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

贸易摩擦初期，关税加码与地缘风险共振，引发资本外流压力。2018-2019年，中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达2044亿美元，较此前三年均值扩大3.2倍。但得益于稳健的货币政策与跨境资本管理，外流规模始终可控。随着贸易战常态化，资本流动呈现“短期脉冲式波动，长期趋于均衡”特征。截至2023年，中国外汇储备稳定在3.24万亿美元，外债结构持续优化，短期外债占比显著低于国际警戒线。

A股市场呈现“跟跌快、修复强”的特征。在美国多次发动关税战期间，沪深指数均大幅下跌，但之后中央汇金、中国电科等“国家队”相继出手，中国依靠政策托底与国资流入迅速推动市场修复。

这场贸易博弈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重塑，本质上是危机驱动的改革。短期看，资本波动与预期管理压力犹存；长期观，则加速了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进程。当全球经济进入“规则竞争”新时代，中国金融市场正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引领”，在压力测试中锻造出更具韧性的发展范式。

三、应对策略分析

（一）扩大内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扩大内需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需形成供给和需求的良性循环。内需侧应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供给侧需加快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培育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政策端应强化财税支持，同时推进数据要素确权、绿电交易等要素市场化改革。通过构建“消费升级—产业升级—政策创新”的三角支撑，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内需主导、创新驱动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二）大力发展国内实体经济

发展国内实体经济需聚焦“固本强基、创新驱动、生态协同”三大路径。首先，夯实产业根基，通过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政策，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次，强化创新引领，设立国家产业创新中心，聚焦半导体等“卡脖子”领域，实施“揭榜挂帅”制度，确保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再者，优化产业生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数据要素确权与流通机制，构建“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新型组织形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最终形成“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现代服务业支撑”的立体格局，实现实体经济规模与质量双

提升。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需构建“严保护、大保护”的立体化体系。严保护方面，应提高侵权法定赔偿上限，对恶意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形成司法震慑；大保护需深化跨部门协同，建立“行政－司法－仲裁”联动机制，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四）推进贸易投资发展

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建设，以高质量共建为核心，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自由化、绿色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合作及人文交流深化五大维度协同推进，形成立体化交通网络，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以制度创新与市场驱动双轮驱动，构建全球货币新格局。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区间，同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建立“风险预警－压力测试－政策储备”全链条防控机制，推动“债券通”“跨境理财通”向股权投资领域延伸，吸引中东主权基金等长期资本配置人民币资产。

经济合作方面，继续深化改革人民币结算机制，逐步与能源出口国建立石油人民币计价机制；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交易，增强人民币全球流动性供给能力。

参考文献

[1] 张菀洛, 张珊珊. 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研究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11): 81–98. DOI: 10.13653/j.cnki.jqte.2020.11.005.

[2] 郭克莎, 李珣. 中美贸易摩擦的动因、趋势和影响分析 [J]. 天津社会科学, 2021, (05): 149–160. DOI: 10.16240/j.cnki.1002-3976.2021.05.016.

[3] 姜卫民, 夏炎, 杨翠红. 关税壁垒真的是限制对手的武器吗? [J]. 管理评论, 2022, 34(09): 47–59. DOI: 10.14120/j.cnki.cn11-5057/f.2022.09.019.

[4] 刘胜湘, 李云鹏. 制裁、脱钩与极限施压：美国对华冷战边缘政策探析 [J]. 东北亚论坛, 2023, 32(06): 16–32+125. DOI: 10.13654/j.cnki.naf.2023.06.002.

[5] 左冰, 武刚, 张晨, 等. 贸易协定对全球贸易流的影响研究：基于复杂网络视角 [J]. 世界地理研究, 2024, 33(01): 1–17.

[6] 邹力行. 中美矛盾与对策思考 [J]. 科学决策, 2023, (12): 173–184.

[7] 周亚敏. 国家间绿色竞争、数字竞争与美国对华选择性“脱钩”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4, (01): 138–170+175–176.

[8] 刘语默. 产业地理与美国对华贸易决策 [J]. 国际政治研究, 2024, 45(01): 8+114–135.

[9] 陶士贵, 仇欣雨. 中国实体受美国经济制裁的影响及其应对策略 [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10): 95–109.

[10] 韩梦雨. 冷战后美国贸易权术复杂系统论：一种内政外交综合分析的新方法 [J]. 国际观察, 2023, (06): 90–126.